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計畫

指導教授：崔光宙

從北京大學招收女學生談起(1919~1920)
以兩性關係為中心的討論

研究生：高資晴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記得國小一年級轟動一時的瓊瑤電視劇《望夫崖》，是一部讓筆者無法忘懷的作品，在其中，筆者第一次接觸到民國初年的女大學生，劇中相當多的女大學生為了能夠唸大學，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那時候筆者一直覺得做一個女大學生是很偉大的，令筆者非常嚮往，同時也認為要做一個女大學生是很困難的，要不斷的爭取及鬧家庭革命，受到很多輿論的批評和污衊，而且在當時並不是每一個女生都能當女大學生。等到筆者自己也是女大學生後發現，原來現實的情形和電視劇演的都是不一樣的，女大學生不再是一個特別引人注意的群體，也不再有人反對女生上大學，而這樣的轉變讓我對此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我開始會去注意一些相關的資訊，希望能夠滿足我對她們的好奇。

直到筆者在大學歷史系中修習「近代中國婦女史」這門課時，才知道原來在民國八年之前，女子高等教育，只有教會辦的北京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福州華南女子大學三所。到了民國八年四月，北京女子師範擴展為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中國才有了自辦的女子大學，然而這些女子大學主要的教育目標，依然尚未完全脫離要培養女性成為「賢妻良母」的終旨，她們仍然要接受許多的家事、縫紉、手藝、園藝等課程。¹從五四時期開始，中國不斷受到新思潮的影響和激勵，當時的知識份子開始討論大學開放女禁的問題，他們認為如此一來，男女便可以接受同樣的教育，女性才能脫離傳統的婦女教育，達到真正的男女平等。

在五四運動過後，要求大學男女同校的呼聲更加高漲，許多女界人士在這呼聲的影響下也行動起來。其中，最明確要求大學開放女禁的是鄧春蘭女士，她曾經上書給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求招收女學生。即使在許多守舊人士輿論的批評和教育部的壓力下，民國九年北京大學仍然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招

¹ 程謫凡，《中國現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67）。

收了第一批的女大學生，開了女學生和男子一同上大學的先例。自北京大學開女禁之後，此後各大學大多給予女生求學權利，男女終於有了平等的受教權。

因此北京大學招收女學生一事，至今都被認為是女性掙脫傳統婦女教育的枷鎖，此後的女子教育，更趨進於男女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²今日的女子接受大學教育不再需要大力的爭取，女大學生成為一個普遍的群體，社會不再會探討女子該不該上大學、能不能和男子共學的議題，均不能忽略了民國九年北京大學招收女學生一事對於現今男女教育機會均等的貢獻。

然而，重新審視民國九年這件對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影響相當重大的事件，雖然民國九年北京大學招收女學生之後，在幾年內，中國大部分的大學，都開始招收女大學生。³但是，當大學紛紛開始招收女學生之後，是否代表了真正的男女教育機會均等，社會上是否完全的接受了男女共同上大學的這件事實，是否所有的家庭都接受自己的女兒進入大學，女大學生是否就能夠自由的選擇受教的科系，大學中的教職人員是否在教學和行政上給予男女學生同樣的對待，大學在增設建設及設備時是否替女性著想，女大學生在畢業後進入社會中，是否和男性一樣被接納等，女子唸大學在當時的社會中，是否只是形式上的兩性受教均等，亦或當時的人在兩性關係的觀念上已經有了實質的改變，都還是值得探討的一環。

因此，筆者希冀藉由五四時期北大招收女學生一事，進一步探討當時的中國在對於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兩性教育理念等兩性關係的觀念上，是否已有了實質上的轉變，更期望更進一步的提供現今的性別教育更不一樣的觀點。

二、研究回顧

早期在中國史的研究領域裡，下層社會、婦女和少數民族等領域原不受重視，自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以來，史學研究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研究重點已經

² 李美玲，〈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研究(1912-1949)〉，(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247)。

³ 程謫凡，《中國現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 176)。

移向了被忽視的「他者」(the other) , 如非西方地區的文明、女性、下層社會和少數民族的研究。⁴因此, 婦女史研究逐漸成為歷史研究中, 一個新興的研究議題。而對於近代中國婦女史而言, 一八四〇年代應該是起始的年代。在一八四〇年代以前, 中國知識界雖然已有人對中國婦女的地位加以反省, 從而謀求改善與提升, 但實際的影響不大。直到一八四〇年代之後, 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要求女性應該接受教育, 並本人道立場, 勸使中國婦女廢止纏足, 這才使得女性的地位漸漸受到重視。⁵

但是在不同的時代, 會有不同的婦女問題, 在清末時期, 大家還只重視婦女是否該纏足、該不該受教育, 但是到了民國建立之後, 受到重視且討論的是男女同學、經濟獨立、社交自由、兩性問題、家庭問題和生育問題。因為研究重點開始重視「他者」的緣故, 婦女史和婦女問題研究漸漸如雨後春筍似的冒出頭來。國內目前投入婦女研究的人員也越來越多, 在這種情形下的婦女史研究, 不僅在方向上越來越寬廣, 而且隨時揚棄舊的歷史問題而發掘新的歷史問題。而與筆者所要探討的主題相關之研究, 也不斷持續進行著。

與本研究有關的文獻, 在專著方面, 與近代婦女史相關的研究論著, 已有羅蘇文的《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⁶、劉寧元主編的《中國女性史類編》⁷和盧燕貞的《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1894-1945)》⁸、喬素玲的《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1840-1921)》⁹、陶浩、鄭必俊主編,《中國女性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等, 這些著作中所探討的主題大多是有關近代中國女性社會和教育等議題。環境的變遷是否影響了中國女性的地位, 中國女性在社會和教育中所擁有的是否和以前有所不同, 在這些研究中都能夠得到解答。但由於這些作者

⁴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 (台北: 巨流圖書公司, 2000)。

⁵ 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 (台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2004)。

⁶ 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6)。

⁷ 劉寧元主編,《中國女性史類編》,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

⁸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1894—1945)》, (台北: 文史哲, 1989)。

⁹ 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1840-1921)》,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主要是總論近代中國女子在社會中以及教育中的變化和發展，因此書中對於北京大學招收女學生一事，均以簡短的篇幅帶過，並無深入的提及當時的中國是在處在如何的背景中使得大學中男女共學終於不再是毫無可能，同時當時的輿論對於此事的支持和反對等說法，以及大學開放女禁之後是否就使得男女平等，在這些著作中，都沒有被完整的陳述。

而在論文方面，李美玲的《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研究(1912-1949)》¹⁰作者在文中提到了北大招收女學生一事，她認為這代表了民國以來的教育慢慢趨進於男女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且兩性的教育理念從傳統「求異」的教育轉向以「求同」作為兩性教育的理想。但是因為作者是總論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發展和轉變，因此並無更進一步的探討在結論中所提到的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和兩性教育理念的轉變，是否只是外在形式上的改變，亦或是當時的社會對於兩性關係的觀念已經有了進步。

趙淑萍的《民國初年的女學生》¹¹主要是在總論民國初年的女學生，包括小學、中學、大學的女學生來源、生活和女學生畢業的動向，對於當時女學生對於女子教育的觀點、女學生在求學歷程和畢業之後的出路所遭遇的困境，本文都有所著墨。因此從此研究中筆者可得知當時的女學生和清末的女學生在對受教育的觀點是否有所差異，社會環境的變化對女學生是否產生什麼影響，女學生在畢業後的發展為何、是否為社會所接受，這有助於筆者對於民國初年的女學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瞭解。但由於作者的研究重心是在對於民國初年的女學生做全盤性的探討，所以這些和男性一起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學生，在此論文中並不是作者所關注的主要焦點。

張三郎的《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1915-1923)》¹²和喻蓉蓉的《五四時期之

¹⁰ 李美玲，《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研究(1912-1949)》，(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¹¹ 趙淑萍，《民國初年的女學生》，(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¹² 張三郎，《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1915-1923)》，(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中國知識婦女¹³，皆以五四時期為背景，論述女性在這個時期的覺醒和女性在這時期對於自我權利爭取所做的努力。張三郎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當時五四時期女權運動所進行的活動和女權運動所爭取到的結果，而喻蓉蓉的研究主要是探討當時五四時期的知識婦女在教育、職業、家庭方面所發揮的能力和其所付出的努力。五四時期新思潮對於女性的影響，從而喚醒女性追求自己的權利，從這些研究中皆可獲得更為深入的理解。由於他們主要關注的是整個五四時期女子的整體作為和成果，因此對於鄧春蘭女士所努力使得北京大學終於首開先例招收女大學生一事，皆為兩位作者所稱許和論述，但是大學開放女禁後，社會是如何看待男女共學之事、是否就完全接受女性和男性一起接受大學教育，在這些論文中都沒有加以探討。

陳重光的《民國初期婦女地位演變》¹⁴，就民國開國至抗戰前，中國婦女在教育、政治、法律、社會等地位的演變進行研究。作者認為在教育上，五四運動以後，國人體認到女子讀書的重要；在政治上，婦女自民國元年即展開一連串的參政運動；在法律上，現行法中規定了男女享有同等地位，並積極予婦女保護；在社會上，自主婚姻的逐漸普遍與職業領域的擴展，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作者從婦女所做的種種女權運動及所得到的成果，來說明婦女的社會地位提高。因此女性能夠突破傳統和男子一起接受大學教育，被作者視為是婦女地位相當大的提升，但是作者並沒有進一步的深入探討此事造成當時婦女地位的改變，是否只是形式上的外在條件的改變，還是婦女在實質上也完全被當時的社會所平等看待。

綜上所述，本文所關懷的主題在學界甚少有人觸及，筆者基於對於民國初年女子教育的興趣，試圖重建中國婦女教育史的一段過程，從北京大學招收女學生一事談起，並進一步探討中國開始追求男女教育機會均等所出現的問題，重建當時中國的對於兩性關係的觀念和看法，並期待提供現今的性別教育一些不一樣的啟示。

¹³ 喻蓉蓉，《五四時期之中國知識婦女》，(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

¹⁴ 陳重光《民國初期婦女地位的演變》，(台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

三、資料簡介

本研究在資料的取材上，約可分為幾部份進行：

- (一) 檔案與史料彙編：包括國史館典藏的 國民政府檔案、教育部檔案 等有關教育方面的史料。史料彙編主要有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四冊)》、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教育紀事》、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中華民國史檔資料匯編》、北京大學出版之《北京大學史料》以及大陸出版之《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等。
- (二) 年鑑與公報：主要有《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申報年鑑》、《大學院公報》、《教育部公報》、《國民政府公報》等。
- (三) 期刊與報紙：《教育雜誌》、《中華教育界》、《婦女雜誌》、《解放畫報》、《少年中國》、《新青年》、《申報》、《大公報》、《時報》、《民國日報》、《國民公報》等。
- (四) 相關人物的文章、回憶錄、日記：如鄧春蘭曾經發表的 我的婦女解放之計畫同我個人進行之方法、春蘭上蔡校長書、告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生同志書、我請求北大開放女禁的經過，王蘭的 北大男女共校以前的我和之後的我、永山央口述、岑獻青整理的 日本義子和他的中國母親王蘭、胡適的 大學開女禁問題、杜威夫人之記錄 杜威夫人講演男女同學問題、陳獨秀 男女同校問題、羅家倫的 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陶行知全集》以及《蔡元培先生年譜長編》等。

筆者希望藉由這些資料瞭解這些北京大學女學生的背景和她們自身及家人對於她們接受大學教育的想法、當時的輿論對於這些北大招收女大學生的支持或批評、政府當局對於這些北京大學女學生的看法、當時的社會如何看待這些和男子接同樣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國女性在被接受可以和男子一同接受大學教育的同

時，是否真正達到了教育機會均等及提升女子地位，更進一步的重建當時中國的對於兩性關係的觀念和看法。儘管目前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不盡齊全，但是對於筆者所關心的這個議題，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和助益，筆者一方面會持續不斷的收集相關資料，另一方面也會對目前所有的資料做初步分析和整理，期望能夠對此議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四、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的發展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當中，女子在「三從四德」的規範下，被教導和培養的德性，都是以順從男子為主。一般女子所受的教育，不是從學校而來的，是由她們的家庭在日常訓導她們的，所以她們所學習的，無非烹飪、縫紉、編結、絲麻以及家庭中的日常瑣事。¹⁵

而在當時得以延師受教者，僅止於特定社群的女子，而這些女子所受的教育，也僅是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到了明末清初時期，女子受教育的人數雖然增多，女子著作的數量豐富，但是這一群中國婦女作家，是屬於一個人數極少的菁英社群，這些女子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是生長在中國江南地區。¹⁶由此推知，受教育的女性還是來自一群有相當經濟背景的社群。除此之外，這些明末清初的才女不管受過多高的教育，在結婚之後，她終究是要回歸到家庭之中，依附在男性之下，將筆墨擱置一旁，專心料理家務。因此，女性受教育的目的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不外乎在闡明婦德婦道，以求婦女達到賢妻良母的典範，讓她離開娘家之後，能為另一個家族世系撫育成功的男性後代，而不是讓她們擁有獨立謀生的能力。

但是這樣的傳統思想，到了清末時有了轉變，清道光(1842)之際，清廷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簽訂了「南京條約」，是為清廷對外不平等條約的開端。從此門

¹⁵ 黃嫣梨，〈中國婦女教育之今昔〉，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1991)，頁 259。

¹⁶ 楊雅婷譯，Susan Mann 著，《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2005)，頁 44。

戶大開，成為西方列強角逐宰割之對象。中國在道光以後的對外戰爭，屢戰屢敗，這也激發了中國知識份子正視國家的窘境，分析國家衰敗的原因並提出國家富強之道，他們認為國家衰敗有部分原因是因為女子卑弱、不事生產所造成，於是針對女子問題提倡興女學與不纏足運動。¹⁷光緒二十三(1897)年，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主張興女學，他在文中提到：¹⁸

上可相夫，下可？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嚴復也提倡女學與女子體育，反對纏足，他認為：¹⁹

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

當時興女學運動的倡導者幾乎都是男性，他們多站在「富國、強民、保種」的立場，希望養成「不纏足、有基本知識，不作丈夫和國家累贅的女子」。在這些知識份子的眼中，婦女只是強國保種的基層負責者，並不鼓勵她們踏入社會，和男子一樣競爭參政，做國家的棟樑和領袖。²⁰

西元 1911 年，清朝覆滅，民國建立，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降臨。民國建立之後，教育部陸續頒布各種學校章程，民國元年 9 月公佈了新的學制，為「壬子學制」，至民國三年 8 月，又陸續頒布了各種學校規程及課程標準，對新學制又有所補充和修訂，於是合成一個更加完備的學校系統，為「壬子癸丑學制」。²¹清末清末女子小學與師範修業年限，都比男子少一年，但是在此學制中，男女的修業年限相等；清末女子無法分享中學教育、實業教育、高等師範教育，但在此時也都列入壬子癸丑學制當中，並且女子學校不再另立系統，這個學制使得女子教育的發展，又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上述的改變這都說明了女子教育發展的突

¹⁷ 李美玲，〈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研究(1912-1949)〉，(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21。

¹⁸ 陳東原，〈中國的女子教育 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缺點〉，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1991)，頁 248。

¹⁹ 轉引自喻蓉蓉，〈五四時期之中國知識婦女〉，(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頁 19。

²⁰ 陳東原，〈中國的女子教育 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缺點〉，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1991)，頁 248。

²¹ 毛禮銳、紹鶴亭、瞿菊農，《中國教育史》，(台北：五南，1989)，頁 538。

破。²²

即使民國初年的女子教育已和傳統大相逕庭，但此時的女子教育，還是不免受到傳統力量的拉扯，阻礙了女子教育的進展，民國二年，當時的教育總長湯化龍發表女教意見，曾說：

考中國女子，本生長於深閨中，見聞至為狹隘，知識亦頗幼稚，時與今日時勢大不相合。其開發女子知識之方法，不可不大加研究。

可以看出他同意開發女子「知識」，但是他認為女子教育仍必須「控制」在適度的範圍，又說：

至於中國女子之性質，則概多靜貞優美，亦幸賴三千年來遵奉一種高尚之道義，行於家庭所致，故未使女子陷於敗德非道之域中，民國以來，頗有一派人士倡導一種新說，主張開放女子之界限，其結果致使幽嫻女子提倡種種議論，或主張男女同權，或倡導女子參政，遂至有女子法政學校之設立，雖屬一時風潮所趨，余觀之，則實屬可憂之事也。

此次禁止私立女子法政學校者，蓋謂該學校在今日，不但絲毫無利益，而反有巨害。余對於女子教育方針，則在使其將來足為賢妻良母，可以維持家庭而已。²³

由此可看出，當時的教育機關在革新女子教育之時，仍然以培養一個「賢妻良母」為最主要的目的。因此即使已經進入民國時期，國體變更，但由於傳統中國賢妻良母的觀念，已經深植人心，而歷史有其延續性，所以持這種看法者還是大有人在。²⁴

到了五四時期，因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在中國喚起了科學精神，並進一步要求民主。此時杜威的實踐主義教育思潮，風行一時，民國八年胡適邀請杜威來中國講學，使知識份子不斷的去思考中國教育的問題，加上當時的報章雜誌不斷的報導杜威所提出的思想，讓大眾對於新思潮與新思想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新

²² 程謫凡，《中國現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 96。

²³ 趙淑萍，民國初年的女學生，（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8-19。

²⁴ 如當時的知識份子梁華蘭在《新青年》裡談女子教育，就認為：「或謂賢妻良母主義，其所需之教育，養成賢母耳，良妻耳。無與之高深，是不與教育平等之義相違背乎？曰未也。夫賢母良妻，乃教育之旨歸，正以受高深教育之故，思想高超，益以知賢母良妻為人類之所急耳。」見梁華蘭，論女子教育，收入於《新青年選粹》，（瀋陽：遼寧大學，2001）。

思潮、新理想的激盪下，五四時期呼籲重視婦女教育的文章也如雨後春筍般的相繼出現，許多鼓吹重視婦女教育的人都認為「教育」是解決「女子問題」，達到「婦女解放」的根本辦法。²⁵而在這個時期爭取婦女受教權的參與者不再是以男性為主，婦女團體在新思潮的激勵下，也開始積極的從事婦女運動。他們主要從人格、參政、公民資格，或從生理、心理觀點上反對以「賢妻良母」為教育目標的婦女教育，而鼓吹超於賢妻良母的教育以及男女平等的教育。²⁶

在五四時期的新思想、新風潮的影響下，男女平等的教育漸漸受到重視。在改革聲不斷的情形下，民國八年，全國教育聯合年會再次提到改革學制的問題，經過三次的探討，議定新學制系統草案，廣徵全國人士的意見。²⁷到了民國十一年，公佈「新學制系統改革令」，此學制一改以往仿日模式，純粹模仿美國學制，又稱「六三三制」或「壬癸學制」。²⁸這個學制最大的特點是不分性別的單軌制之確立。這代表著教育從此真正為男女所共有，在平等的原則下，男女共同享受平等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男女皆無差別待遇。這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女子教育走向新式女子教育一個相當重要的成果。

²⁵ 黃嫣梨，〈中國婦女教育之今昔〉，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1991)，頁 260。

²⁶ 李曉蓉，〈五四前後女性知識份子的女性意識〉，(高雄：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86。

²⁷ 毛禮銳、紹鶴亭、瞿菊農，《中國教育史》，(台北：五南，1989)，頁 540。

²⁸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頁 11。

參考文獻

一、史料彙編

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1919~1949)》，(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

多賀秋五郎，《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教育部，《十九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簡編》，(南京：教育部，1934)。

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上海：中華書局，1933)。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二、年鑑、公報、報紙

《大公報(天津)》，民國 8 年至 20 年。

《申報(上海)》，民國 8 年至 20 年。

《民國日報(上海)》，民國 8 年至 20 年。

《時事新報(上海)》，民國 8 年至 20 年。

《時報(上海)》，民國 8 年至 20 年。

《晨報(北京)》，民國 8 年至 20 年。

教育部，《教育公報》，民國 8 年至 20 年。

教育部，《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台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81)。

教育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台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81)。

三、雜誌

《少年中國》，1-2 卷，民國 8 年至 10 年。

《北京大學學生週刊》，4-9 號，民國 9 年 1 月至 3 月。

《前鋒》，1-3 號，民國 12 至 13 年。

《新青年》，民國 5 年至 10 年。

《婦女雜誌》，1-17 卷，民國四年至二十年。

四、專書

丁守和，《中國近代啟蒙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編，《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論和實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毛禮銳、紹鶴亭、瞿菊農，《中國教育史》，(台北：五南，1989)。

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 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

呂芳上主編，《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

李華興，《民國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金以林，《近代中國大學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徐安琪主編，《社會文化變遷中的性別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馬冀等選編，《新青年選粹》，(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1)。

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4)。

陶浩、鄭必俊主編，《中國女性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1840-1921)》，(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程謫凡，《中國現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

楊雅婷譯，Susan Mann 著，《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2005)。

劉寧元主編，《中國女性史類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香港：龍門書店，1969)。

鄭新蓉、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與婦女發展》，(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1894—1945)》，(台北：文史哲，1989)。

五、論文

李美玲，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研究(1912-1949)，(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李曉蓉，五四前後女性知識份子的女性意識，(高雄：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張三郎，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1915—1923)，(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陳東原，中國的女子教育——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缺點，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1991)。

喻蓉蓉，五四時期之中國知識婦女，(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

黃嫣梨，中國婦女教育之今昔，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1991)。

趙淑萍，民國初年的女學生，(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